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逻辑与当代治理启示

傅丽君¹

(1.南京林业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根基, 通过群众利益融合、制度化设计与传播创新, 实现了思想引领与社会动员的有机统一。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实践为研究对象, 系统梳理其理论武装、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文化宣传五大核心方法, 揭示其历史逻辑与治理智慧。通过整合历史文献与政策文本分析, 进一步反思其历史局限性并提炼其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启示, 为当前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跨越时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 对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抗战时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代治理启示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5.968

一、历史坐标与时代命题: 抗战胜利 80 周年

2025 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为重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契机。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从近代屈辱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转折点, 其背后的思想政治动员机制不仅是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核心密码, 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在此背景下, 系统梳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既是对历史经验的学术回溯, 也是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刻反思。当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 如何在复杂环境中凝聚共识、强化主流价值观, 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为此提供了跨越时空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

现有学界对抗战时期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多聚焦于具体政策^[1]、人物^[2]或个案分析^[3], 但对整体方法体系的提炼及其普适性价值的探讨仍显不足。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也是超越时空的治理智慧。本文试图通过整合历史文献、政策文本与案例分析, 系统总结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五大核心方法, 结合当前社会治理与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需求, 通过学术化梳理与时代化转化,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谱系, 更能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深层动力。

二、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脉络与核心方法

(一) 历史背景与挑战

1. 抗战爆发初期 (1937-1941): 民族危亡下的思想动员任务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此时, 国民党政府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导致国内政局动荡、社会分裂, 而日军的军事侵略与经济封锁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苦难。面对这一局面, 中国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 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 推动国共合作, 建立以国共两党为主体、涵盖各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海外华侨及普通民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 这一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 党员干部需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例如, 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指导实际斗争; 另一方面, 如何将抽象的民族解放理念转化为普通民众可感知的行动目标成为关键任务。例如, 《论持久战》通过通俗化理论普及, 打破民众对“亡国论”的悲观情绪, 同时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平衡各方利益, 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抗战。

2. 相持阶段 (1941-1942): 根据地内忧外患中的思想整肃

1941 年后, 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对敌后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 同时切断中共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 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 (如皖南事变), 导致根据地陷入“黎明前的黑暗”。在此背景下, 中国共产党亟

作者简介: 傅丽君(2000—),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

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党内思想混乱的问题。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并存,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此外,物质资源匮乏迫使党探索自力更生的路径,例如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深入人心。国际援助中断也促使中共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续整风运动奠定基础。

3. 战略反攻阶段(1943-1945): 思想政治教育 with 军事行动的深度融合

1943年后,随着日军战线拉长,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对日作战的主力。此时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向巩固根据地、提升战斗力的目标。一方面,制度化建设的需求日益迫切,例如《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强化纪律性,反对个人主义;另一方面,群众基础的深化成为重点,通过“减租减息”“诉苦运动”等政策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同时,文化意识形态的塑造也成为关键任务,文艺作品如《白毛女》《黄河大合唱》将民族精神与革命理想结合,形成“延安精神”的文化标识。

从抗战初期的民族存亡与群众动员困难,到相持阶段的内部思想混乱与外部封锁,再到战略反攻阶段的根据地治理能力不足与文化认同缺失,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应对策略逐步化解危机。例如,在理论武装方面,通过党校培训、干部轮训等形式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群众路线实践中,利用通俗读物、戏剧表演等贴近民众的形式实现思想渗透;在文化宣传中,依托《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媒体扩大影响力。这些举措不仅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更深刻影响了党的执政理念,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引领”,从“局部经验”到“系统理论”,最终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治理逻辑。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特定时期的应急手段,更是实现长期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工具,其背后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与实践结合”等原则至今仍具普适性价值。

(二) 核心方法与路径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实践创新性,其核心路径可概括为五大维度:理论武装与信仰教育、群众路线与基层渗透、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文化宣传与精神塑造。这些方法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当时复杂政治生态与社会结构的适应性回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组织群众、推动革命进程的关键工具。

1. 理论武装与信仰教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深化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通过系统化理论教育强化党员与群众的阶级意识与革命信念。一方面,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不仅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提供了哲学基础,更通过通俗化语言使抽象理论转化为民众可理解的思想武器。另一方面,党建立了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中央党校、抗大等机构成为干部理论学习的核心阵地^[4]。通过课程设置(如《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基础》)、教材编写(如《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及集中轮训,党员干部得以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从而在实践中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此外,党还注重通过“讲坛式教学”“讨论式学习”等形式,将理论教育与具体斗争任务结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宣讲《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减租减息政策中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内涵,实现了理论认知与实践行动的有机统一。

2. 群众路线与基层渗透: 政治动员的多样性与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路线,通过多元化的政治动员手段将思想教育渗透至社会基层。一方面,党依托报刊、广播等媒介扩大宣传覆盖面。《新华日报》《解放》周刊等党报党刊通过连载《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纲领性文章,结合漫画、短评等通俗形式,使抗日理念深入人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则通过电波向全国乃至国际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党充分利用艺术载体实现“寓教于乐”。戏剧《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以东北家庭受日军压迫、农民参与生产互助为主题,通过街头演出与巡回剧场直接激发民众情感共鸣;歌曲《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旋律凝聚民族精神,成为抗战文化的象征。此外,党通过制度化设计构建统一战线。在敌后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治理,形成了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网络^[5]。此外,党还通过“诉苦会”“拥政爱民”等群众活动,将思想教育融入日常生活,例如通过揭露封建剥削唤醒农民阶级意识,或通过军民联欢巩固军政关系,最终实现了从“思想共识”到“行动自觉”的转化。

3. 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 方法论革新与实践导向

延安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重大突破。为此,党通过调查研究制度化推动思想教育的科学化。一方面,要求干部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开展社会调查,撰写《兴国调查》等典型报告,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并提炼政策依据;另一方面,通过“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将宏观战略部署细化为可操作的基层实施方案。例如,在土地改革中,党通过试点村的调研发现“平均分配”可能引发富农不满,进而调整政策为“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并行,既保障农民利益又稳定社会秩序。此外,党还通过“典型示范法”推广成功经验,如将陕甘宁边区“南泥湾大生产”模式作为自力更生的典范,激励其他根据地效仿。这种以实证为基础的方法论,不仅纠正了党内脱离实际的倾向,也为后续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支撑。

4. 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 思想整肃与组织净化

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系统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实现了党内思想的统一与组织的纯洁化。党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强调通过坦诚交流而非简单斗争解决思想分歧。一是通过建立个人自传制度,要求党员全面梳理自身思想历程,主动暴露历史问题(如曾参加其他党派或存在“左”倾错误),以此促进自我反思;二是推行小组讨论制,以党支部或学习小组为单位开展“开门整风”,允许群众参与评议干部作风,例如在晋察冀边区通过群众举报整治官僚主义;三是将整风与纪律审查结合,针对特务嫌疑人员实施“审干”程序,但后期因“抢救运动”过激而调整策略,最终形成“审慎甄别”的制度规范。这一机制不仅清除了宗派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也强化了党的纪律性与凝聚力,为后续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5. 文化宣传与精神塑造: 主流价值的文化赋形

中国共产党通过文化创作与符号建构,将抽象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具象的精神标识^[6]。一方面,党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创作反映抗战现实与社会主义理想的作品。例如,《白毛女》以地主压迫下的农民觉醒为主题,通过戏曲形式批判封建剥削,同时展现党的领导作用;木刻版画《纺车旁的补课》描绘妇女在劳动间隙学习识字的场景,赋予“扫盲”以革命意义。另一方面,党通过仪式化活动塑造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例如,“延安精神”被概括为“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并通过领袖讲话(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活动(如清明节祭奠烈士)不断强化;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则通过标语、快板等形式普及,使军队行为规范内化为战士的道德准则。这种文化赋形策略,不仅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也使党的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中成为社会主流话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与创新性。其核心逻辑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以群众路线为实践根基,以实事求是为方法论原则,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纠偏机制,以文化宣传为传播载体,最终实现思想引领与社会动员的双重目标。这一方法体系不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更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治理智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范式。

三、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总结

(一) 方法论特征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体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土化的创造性实践,也是对复杂历史条件的适应性回应。其方法论特征呈现出鲜明的辩证统一性与实践导向性,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1. 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再指导实践”的闭环模式,实现了意识形态建设与革命任务的高度契合。例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以军事战略为核心,同时融入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示战争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为民众提供了科学认知框架;而《实践论》《矛盾论》则通过通俗化语言,将抽象哲学思维转化为群众可理解的思想武器。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灌输,而是通过党校培训、干部轮训等形式系统传播理论,并结合《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典型调查成果,不断修正政策方向,形成“典型示范——经验推广——政策修正”的动态循环。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不仅强化了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也确保了政策制定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范式。

2. 思想教育与群众利益的深度融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将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群众切身利益之中,通过“物质利益+精神引领”的双重路径实现动员目标。例如,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经济政策直接改善民生,使群众在物质获得感中认同党的领导;又如,《黄河大合唱》等文艺作品以艺术形式揭露封建剥削、凝聚民族精神,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叙事,激发群众情感共鸣。同时,党通过“三三制”政权建设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治理,既缓解阶级矛盾,又扩大抗日力量基础。这种将思想教育与群众现实需求相结合的策略,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说教,通过满足群众物质与精神诉求的双重逻辑,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

3. 制度化与灵活性的平衡展现了动态治理的组织智慧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展现出极强的组织创新能力,通过刚性制度设计与柔性策略调整的结合,构建了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7]。一方面,建立党校培训、政治工作条例、个人自传制度等长效机制,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首次明确“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调整教育重心,初期以“全民抗战”为核心,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街头演讲广泛动员;相持阶段转向“思想整肃”,通过延安整风运动解决党内教条主义问题;反攻阶段则聚焦“巩固根据地”,通过新秧歌运动深化群众认同。此外,党通过“党——政——群”三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协调多方力量,如边区政府通过“拥政爱民”运动协调军民关系,文艺工作者深入部队创作反映抗战现实的作品,形成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效应。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既确保了行动的稳定性,又保持了应对复杂环境的灵活性,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与高效率。

(二) 成功要素分析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其成功背后蕴含着多重关键要素。这些要素成功要素共同构成了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以思想权威为核心,以群众基础为根基,以传播创新为路径,以制度设计为保障,最终形成了“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滋养理论”的良性循环^[8]。

1.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思想权威的确立是思想政治教育成功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创新确立了思想权威。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普及成为这一阶段的核心标志。从《论持久战》的战略分析到《实践论》《矛盾论》的方法论阐述,再到《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体系建构,毛泽东的著作不仅为党员干部提供了科学认知框架,也为普通民众理解抗战意义提供了通俗化路径。例如,1937年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通过明确“全面抗战”“持久战”等战略目标,迅速成为动员群众的思想武器;而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从“自在的党”向“自为的党”的转变。这种思想引领与组织权威的结合,确保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复杂环境中的方向性与稳定性。

2. 广泛的社会动员能力与群众基础的巩固是思想政治教育成效的实践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展现出极强的组织渗透力,通过多层次的动员策略实现了思想教育与社会行动的深度融合。一方面,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吸纳各阶层力量:在敌后根据地推行“三三制”政权,吸纳地方士绅、知识分子参与治理,既缓解了阶级矛盾,又扩大了抗日力量的基础;另一方面,党通过“减租减息”“诉苦运动”等政策直接改善民生,使群众在物质获得感中认同党的领导。例如,晋察冀边区通过土地改革激发农民生产热情,陕甘宁边区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自给,这些举措将抽象的政治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利益分配,增强了群众的参与感与归属感。

3. 创新的传播方式与适应性调整是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深化的关键动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并非固守单一的教育模式,而是根据历史阶段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初期(1937-1941),党通过报刊宣传(《新华日报》《救亡日报》)、街头演讲等形式广泛发动群众,例如周恩来发表的《论统一战线》演讲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等口号,迅速点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相持阶段(1941-1942),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解决党内思想混乱问题,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推动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转变,并通过“小组讨论制”“开门整风”等制度化程序确保思想统一;反攻阶段(1943-1945),党则将思想政治教育 with 军事行动紧密结合,例如在战斗前开展“诉苦”教育,揭露日军暴行以激发士兵斗志,或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军队行为,塑造革命军人的道德准则。这种动态调整的策略,使思想政治教育始终与时代需求保持同步,既解决了阶段性任务,又积累了可持续发展的经验。

4. 制度化设计与柔性治理的协同是思想政治教育效能提升的组织保障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建立了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既通过党校培训、政治工作条例、个人自传制度等刚性机制确保教育的规范性,又通过调查研究、典型示范、群众评议等柔性手段增强实践的灵活性。例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制度保障;而《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典型调查报告,则通过实证研究修正政策偏差。此外,党还通过“党—政—群”三位一体的工作网络协调多方力量。这种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既确保了行动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又保持了应对复杂环境的灵活性,最终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覆盖与高效率。

(三) 历史局限性反思

尽管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受限于特定历史条件与实践探索的阶段性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 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干扰影响了理论创新

早期部分党员干部机械照搬苏联革命模式(如“城市中心论”),忽视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路径;而后期个别地区又陷入经验主义误区(如晋察冀边区因轻信“粮食充足”导致饥荒),暴露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不足。这种思想偏差虽在整风运动中被纠正,但在实践中曾削弱党的科学决策能力。

2. 宗派斗争对统一战线的负面影响

整风运动初期的“抢救运动”因“逼供信”问题引发群众信任危机,虽经毛泽东干预调整为审干与整风结合,但仍暴露了党内政治生态的脆弱性。此外,部分干部在根据地治理中存在排他倾向(如排斥非党员参与政权建设),削弱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包容性。

3. 历史环境的极端性限制了教育方法的普适性

抗战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高度依赖军事动员与生存压力(如“大生产运动”),其强制性与功利性色彩较强,难以完全适用于和平时期的社会治理需求。例如,“诉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激烈形式,在常态化的社会环境中易引发新的矛盾。这些局限性表明,思想政治教育需在动态实践中不断修正与完善,既要坚持核心原则,也要避免僵化模式对复杂社会关系的过度简化。

四、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启示

（一）对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指导意义

1. 强化理论武装与价值观引领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论持久战》《实践论》等理论著作实现思想引领的经验，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参照。当前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大众化传播，突破传统灌输式教育的局限，借助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形式以通俗化语言普及理论。例如，通过算法推荐精准匹配不同群体的认知需求，提升理论传播的渗透力与接受度。同时，面对网络时代的舆论挑战，需构建“理论——实践——反馈”的闭环机制，例如通过青年亚文化研究识别价值冲突点，以“接地气”的叙事策略回应社会关切，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与凝聚力。

2. 坚持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结合

抗战时期通过“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政策实现思想教育与众群众利益融合的经验，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了实践路径。在乡村振兴与社区治理中，需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例如通过“枫桥经验”深化干群关系：依托网格化管理机制开展入户走访，精准识别群众思想动态；利用数字政务平台实现政策透明化，增强群众参与感。此外，需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群众实践具有创造性，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应始终坚持师生平等原则，进行共情式沟通和启发式教学^[9]。通过“三查三整”制度化的延续，确保思想政治教育在基层治理中的常态化嵌入，形成“问题发现—群众参与—协同解决”的治理闭环。

（二）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启发

1. 数字化转型中的教育模式

抗战时期通过报刊、戏剧等多样化载体实现思想渗透的经验。在数字时代改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是有效解决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丰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迫切需要^[10]。在当代可转化为技术赋能的教育模式，例如，借助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思想特征，针对青年亚文化（如二次元、电竞圈层）设计差异化传播策略；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如抗战纪念馆数字化），增强沉浸式学习体验，使抽象理论具象化。此外，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学习系统可替代传统“一刀切”培训，例如通过智能问答机器人实时解答党员干部的学习疑问，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与针对性。

2. 文化自信与主流价值的融合

抗战时期文艺宣传将民族精神与革命理想结合的经验，为当前文化自信建设提供了创作范式。需开发红色IP资源（如《觉醒年代》《长津湖》），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主旋律作品的破圈传播，例如将英雄叙事融入流行文化符号（如游戏、动漫角色）。同时，需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元素，与现代思政教育衔接：例如在中小学课程中增设“家国文化”专题，通过经典诵读与社会实践结合，培育青少年的集体认同感与责任意识。

（三）对应对重大危机的启示

1.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思想动员

抗战时期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整合多方力量的经验，为当代突发公共事件（如新冠疫情）提供了治理镜鉴。例如，借鉴“三三制”政权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决策的模式，建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协同应对机制；通过透明化信息传播（如每日疫情通报）与情感共鸣叙事（如“最美逆行者”故事），化解社会焦虑并凝聚共识。此外，需完善应急心理干预体系，例如依托社区网格员开展心理健康服务，避免极端情绪引发次生风险。

2. 国际话语权构建

抗战时期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向海外传播抗战信息的经验，为当前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战略思路。需以抗战精神为纽带，讲好中国故事，例如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项目中展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通过李子柒等文化输出案例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同时，需主动应对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构建基于平等互鉴的全球话语体系：例如在涉及中国台湾、新疆等问题的国际争议中，借鉴“诉苦会”叙事策略，通过个体故事与集体记忆的结合，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立场的理解与认同。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仍具普适性价值。唯有将历史智慧与当代需求相结合，才能在复杂环境中筑牢思想防线、凝聚民族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结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深刻体现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辩证统一。通过理论武装、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核心原则，党不仅凝聚了全民抗战的力量，更塑造了以“延安精神”为内核的文化标识。这一历史经验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价值引领与社会实践的有机融合，至今仍具普适性价值，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智慧。面向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对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维度。一方面，应加强地方性史料的挖掘，通过区域比较分析揭示不同根据地教育策略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从而丰富对历史复杂性的认知；另一方面，需拓展研究视野，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科技伦理、生态伦理等新兴领域的交叉议题，回应时代变革中的新挑战。唯有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方能构建更具韧性和适应力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与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 [1]谢飞.全面抗战时期新疆社会教育研究——以政治动员为视角的考察[J].西域研究,2020,(04):49-58+168.
- [2]薛延飞,王东维.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04):92-95.
- [3]阮云志,梁亚婷.延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研究——以《边区群众报》为例[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9,12(02):119-126.
- [4]吕星卓.延安时期党员干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06):20-24.
- [5]翟兴娥,徐玉莲.延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对当前高校育人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07):118-121.
- [6]张铮,于天洋.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22,(06):107-116.
- [7]闫惠惠.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转化对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11(02):119-127.
- [8]张铮,于天洋.延安时期党领导边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主要特征及现实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22,(06):107-116.
- [9]郭呈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观的群众实践逻辑[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02):77-84.
- [10]傅安洲,阮一帆,王兴.高度重视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体系建设[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07):18-20.

Localisatio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of Marxist Class Theory - An Analysis of the Classes in Chinese Society as an Example

Fu Lijun¹

¹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stablished it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ough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y integrating mass interest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nnovative dissemination, it achieved an organic unity of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social mobilization. Focusing on the historical practice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five core methodologies: theoretical arming, the mass line,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and cultural propaganda, thereby revealing their historical logic and governance wisdo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policy texts, it reflects on their historical limitations while distilling insights for ideologic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ranscending spatiotemporal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contemporary social governance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fering significant reference value for building a moder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Governance